



王真吾師賜顧聞
道修復童來
有教無類
在空疏一路
過於史而所中
是似忍痛言之
在南來及來此
間乃知
者一謂之爭以
為一闕之



任繼愈文集 2

任繼愈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任继愈 著
本书编委会 编

任继愈文集

2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理学之遠源本於洙泗，久成定論。自秦
餘年間，其全部思想及問題進展之歷程為
討論，但詳人之所異，異人之所詳。疑似之言，
概所不取。為明立論宗旨，異闡五義。一曰自
曰社名終，三曰辨析異同，四曰明字要，五曰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石渠留田室笈
魯壁幽弦歌

山東省各書館
建館八十周年

任繼愈

賀

目 录

中国哲学史研究一

专集一

中国哲学史论

学习中国哲学史三十年(代序)	1
试论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	16
中国哲学史发展规律的探索	24
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所遇到的几个困难问题	59
论哲学史的继承问题	66
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特点	83
历代农民革命战争对中国哲学史的作用	95
研究哲学史首先要尊重历史	103
古代神话传说中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	118
《易经》和它的哲学思想	122
孔子——奴隶社会的保守派 封建社会的“圣人”	134
孔子政治上的保守立场和哲学上的唯心主义	164
孔子讲的“仁”能不能是人类普遍的爱	179

老子的研究	184
论老子哲学的唯物主义本质	213
春秋时代天文学和老子的唯物主义思想	234
唯物主义的王夫之为什么反对唯物主义的老子?	250
如果老子是唯物主义者	266
释《老子》书中的“式”	274
庄子探源之一	
——从唯物主义的庄周到唯心主义的“后期庄学”	277
庄子探源之二	311
庄子探源之三	
——论庄周哲学思想的阶级实质	329
庄子探源之四	
——“后期庄学”(内篇)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	347
庄子探源之五	
——庄周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361
论《齐物论》不代表庄周思想	402
释《庄子·齐物论》篇的“以明”	414
墨子生卒年简考	419
《孙子兵法》中的辩证法因素	425
韩非社会政治思想的几个问题	435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中所反映的有关古代	
社会性质的问题	460
先秦诸子与百家争鸣	465
先秦哲学无“六家”	
——读司马谈《论六家要旨》	468
中国古代医学和哲学的关系	
——从《黄帝内经》来看中国古代医学的科学成就	473

司马迁的哲学思想	497
王弼“贵无”的唯心主义本体论	511
魏晋清谈的实质和影响	532
长期被埋没了的民主思想家——邓牧	539
马建忠的思想	544
何启、胡礼垣的改良主义思想	554
鲁迅同中国古代伟大思想家们的关系	571
悼念汤用彤先生	589
从中国古代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发展看五四运动的 科学与民主精神	595
后记	603

中国哲学史论*

学习中国哲学史三十年(代序)**

我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研究工作,按时间累计,约有四十年。抗战时期,在昆明西南联大时,就开始讲授中国哲学史和从事有关这方面的专题研究。但是,真正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应当说是从1949年开始的。实际上,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科学,是解放后在党的关怀下逐渐建立起来的。这个科学在发展中,一方面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另一方面也走过不少弯路。如何恰如其分地估计这门科学的历史和现状,促进它的进一步发展,是每个从事这门科学的同志都十分关心的问题。

解放前的中国哲学史研究

现代意义的“哲学”这个概念,在封建时代并不存在,因为那时还没有现代科学的分类和社会分工,还不曾有过现代意义的“哲学”这样的学科,只有约略相当于哲学的一些部类。中世纪

*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原载《哲学研究》1979年第9期。

的欧洲只有神学一门学问,其他门类都是神学的仆从,哲学包括在神学里面。古代中国主要是“经学”一门学问,它不像欧洲中世纪神学那样挂出神学招牌,是一门经天纬地、无所不包的学科。中国古人认为一切原则、规律以及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经学中都讲到了,有什么疑难问题,只要到《五经》或《六经》中去找,都能找到答案。中国的经学不具神学之名,而有神学之实。

封建社会的哲学史名著,如《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其中大部分讲的是中国哲学问题(也包括经济学、伦理学、教育学、历史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内容),但不具哲学和哲学史之名。严格地说,进入现代后,才有近代涵义的哲学和哲学史。

近代中国出现了资产阶级,到了“五四”时期,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新旧思想交锋。这时期中国哲学史也有了新的发展。

“五四”前夕,胡适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这部书得到当时提倡新文化的进步人士蔡元培的赏识,随后又得到社会上的广泛重视,胡适也自称它是开山之作。这部书在1954—1955年全国性的批判胡适实用主义运动中受到了批判。批判了他的唯心史观,驳斥了他的实用主义观点,并指出了他的其他方面的错误,很多文章的意见是对的,这里不再重复。现在要指出,胡适这部书的确有胜过以前封建学者的地方。胡适打破了封建学者不敢触及的禁区,即“经学”。“经”是圣贤垂训的典籍,封建社会的一切成员,只能宣传它,解释它,信奉它,不能怀疑它,不准议论它,更不能批判它。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都是圣人,只能膜拜,不能非议,这是封建社会的总规矩(西方中世纪对《圣经》也是如此)。据当时人的印象,读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使人耳目一新。作为一部哲学史,表达方式有条理,这只是形式,当时人认为“新”的地方主要在于它不同于封建时代哲学史书的代圣贤立言,为经传作注解,而敢于打破封建

时代沿袭下来的不准议论古代圣贤的禁例。他把孔丘和其他哲学家摆在同样的地位,供人们评论,这是一大变革。至于胡适标榜的“明变”、“求因”等,所谓寻找中国哲学史的规律的狂言,不过是空洞的议论,没有什么价值,二十多年前人们已批判过了,可以存而不论。只要把胡适的哲学史与封建时代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对比一下,显然可以看出两者的差异。黄宗羲被认为是封建社会第一流的学者,他的两部“学案”汇集了相当丰富的资料,今天仍然不失为研究宋明理学的有用的参考书,但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不敢大胆非议圣人。而资产阶级的学者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则敢于非议圣人,这是时代赋予研究者的胆识,不单是胡适的功绩。只有当时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才能用批评的态度评论封建社会的人和事。处在封建社会里面的人,大都是看不清也不允许去看清封建社会的。这就是所谓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吧。

继胡适之后,冯友兰先生写的《中国哲学史》,是一部完整的著作,不像胡适的著作有头无尾,资料也丰富。这是沿着胡适开辟的道路继续向前走的书。这部书出版后,也对社会影响了若干年。这部书对封建主义采取妥协的立场,不像胡适的第一部书问世时那样给人以新鲜感觉了。继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以后,出现的性质相近或相似的其他著作,有梁启超、萧公权、钱穆等人的政治思想史、学术史等。这些著作,比封建时代的哲学史都不同程度地有所前进。但是,总的说来,这些都不能算作阐明中国哲学史发展规律的科学著作。中国哲学史虽在大学及学术界有此一门科目,但是没有能够成为一门科学。

解放前,在历史学领域内,有几位前辈开拓荒地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杜国庠等同志都在不同的方面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中国的古代社

会、古代历史以及古代思想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材料虽也是人们常见的《五经》《二十四史》，但经过一定的科学分析，使人们透过各种现象的迷雾，看到了一些真相，或者说更接近于真相。我不是说这几位前辈们的著作毫无可以讨论的地方，已成定论，而是说，即使他们的著作有些缺点和错误，但他们走的方向道路是一条阳关大道，他们的作品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探索的教材，具有示范作用。如果没有这些前辈们解放前的一些著作作为标本，解放后的一些新手在学习并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探索的路上不知要遇到多少困难，要走多少弯路。

学习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哲学史

解放后，党十分关怀知识分子的成长，积极帮助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解放初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哲学系的教师和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定期（每两周一次）举行讨论会。当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们过去基本上都未曾接触过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讨论会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式。经常参加的，北京大学有汤用彤、贺麟、郑昕、洪谦、朱光潜、胡世华、齐良骥、任继愈等人，清华大学有金岳霖、冯友兰、张岱年、任华、邓以蛰、王宪钧等人。当时研究马克思主义多年的艾思奇、胡绳、侯外庐、何思敬等同志常来参加，徐特立同志有时也来参加。讨论会人数不多，自由参加，不拘形式，每次都有一人作中心发言，其他人围绕这个中心问题自由发言。金岳霖同志讲过形式逻辑，胡世华同志讲过数理逻辑，郑昕同志讲过康德，贺麟同志讲过黑格尔。发言多的是艾思奇、胡绳、何思敬几位同志。他们除了介绍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外，还给大家解答一些问题。当时我们没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还很不清楚。通

过这样的学习、交流,获益很多。后来,艾思奇、胡绳同志还兼任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授,系统地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当时,还成立了一个新哲学会,会长是李达同志。在这个学会里分中国哲学史、外国哲学史、逻辑、中国近代思想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几个组。这个组织除了举行大型的报告会外,也为北大、清华两校的哲学系编写教学大纲,编选资料,后来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资料汇编》,就是这时开始编选的。龚自珍和魏源开始被写进中国哲学史,在这以前对刘逢禄、廖平还有人讲,龚、魏则被忽视。

当时我们的学习,基本上是用从延安带来的办法。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采取教训人的态度,一些旧社会过来的唯心主义者,也没有顾忌地提出问题讨论。那时还没有提出过“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的口号,但大家实际上做到了“三不”。记得艾思奇同志曾主张形式逻辑就是形而上学,但与会的逻辑学教师都提出不同的意见,争执了很久,讨论了若干次。最后艾思奇同志放弃了他的意见,也认为形式逻辑不等于形而上学。

学习马克思主义,光讨论不行,更重要的是必须系统地阅读、钻研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解放前,在国民党统治区里,这些书是被禁止的,不得公开发行。解放后,学习条件变了,我们有充分的时间,也能够读到马、恩、列、斯的重要著作。那时全集还没有译出来,但也可以读到一些外文本(如英、德、俄文本)。

除了书本的学习,还参加了社会活动,群众工作。经常在京郊参加一些农村的社会活动,还到全国各地参加土地改革运动,上述北大、清华的教师们除年老体弱者外,差不多都参加过这类社会实践活动。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史研究者,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历史。我自己深切

感到,由于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与农民共同生活在一起,思想感情有了很大的变化,从此真正感到过去儒学家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都是假的。即使古人真正这样想的,也救不了天下,救不了人民,只能把旧中国拖向苦难的深渊。解放后不久,我对多年来最敬重的一位教授,也是我的老师说:你讲的儒家、佛教的那套哲学,我不信了,我要重新学习。

经过了三年恢复时期,国民经济有了发展,国家开始大规模、有计划地建设。文化教育事业有了大的调整。1952年院系调整,全国各大学的哲学系都取消,合并到北京大学,组成一个哲学系。这时的哲学系教授、副教授共有四十多人,人才济济,得未曾有。教材建设也在这时开始。

苏联派了不少哲学专家来我国,学制也进行了改革。他们的教材,教学方法,教学组织机构介绍过来,我们一齐接受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先后来过几位苏联专家。我们今天哲学系四十岁以上的教师大都听过苏联专家讲课。苏联那时还没有系统的中国哲学史教材,而西方哲学史的教材却系统地介绍到我国来了,并发生了广泛的影响。

我们可以读到马、恩、列、斯的全部著作,也有了辅导、解释这些著作的一些书籍。使人们对马列主义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是也不能不指出,苏联的学风也给中国的学术界、哲学界带来一些消极影响。

第一,苏联对欧美的传统哲学有偏见,特别是苏联在卫国战争后,对德国的古典哲学有偏见,因而不能客观地对待,不那么实事求是。

第二,苏联教学中只讲正面的,不讲反面的,参考书也只限于正面的,导致学生思想简单化,只讲唯物主义,少讲唯心主义,

甚至不讲唯心主义。用这样的方法,讲马列主义已经不行,讲哲学史就更加不行。

第三,苏联学术界的习惯,只允许有一种讲法。遇到学术界有争论的问题,由政治局派人来做出结论,学术界按照结论来执行。最明显的例子如日丹诺夫在西方哲学史讨论会上的发言,成了研究哲学史的唯一指导方针,不允许讨论商榷。这是用行政手段来解决学术问题,把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来对待,对科学发展有害无益。而这些消极影响,也波及中国的学术界。

总起来说,通过解放初期这段系统认真的学习,历史唯物主义被广大学者接受,并把它运用于一切社会历史领域内。中国哲学史这个阵地也被历史唯物主义所占领,逐渐地成为一门崭新的社会科学。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成就

三十年来,就作品来说,出版了通史、断代史、专题研究、论文集等,但纯属中国哲学史范围的不到十种。就人力来说,专业队伍不到二百人,与我们的任务相比,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专业力量还是十分薄弱的。尽管如此,我们的成绩还是很大的。

首先,我们毕竟有了一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专业队伍,也拥有一大批业余爱好者。建国以来有几次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讨论,如对孔丘的评价问题,除了专业人员以外,社会上很多人参加了讨论。这样一支队伍,在解放前是不可想象的。这支队伍也正是今后进一步发展中国哲学史的主力军。

同时,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科学,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已得到全国的公认。从孔丘到孙中山,进行了初步的描绘。不同的研究者分别做出了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结果

论,应当承认这是科研工作的正常现象。人们对从古到今各个时代的重要哲学家和流派进行了初步的分析,虽然这种分析是粗略的,有时是片面的。对几个重要的哲学家还进行过比较广泛的讨论,比如对孔丘、老聃、庄周、王夫之等人都开展过全国性的讨论,对哲学史方法论也进行过多次讨论。这些讨论虽然不可能得到一致的结论,却进一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领导地位,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使参加者从不同的意见中吸取营养,无疑能够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

对各个重要的哲学家或学派摸了摸他们的特点、性质以及他们的基本主张,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在当时是进步还是保守、反动,他们的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社会历史观有些什么内容,等等。如果把这种工作看作研究哲学史的最终目的,当然不对,但为了进一步开展研究,摸清上述情况,则是不可缺少的。可能分类分得不妥当,可能把性质看错了,这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常常看到对同一个哲学家或学派持有相反的意见,在研究中出现分歧,这不是混乱,恰恰是这一门学问兴旺发达的标志。

解放后的中国哲学史打破了旧哲学史的框框,把军事辩证法和自然科学中的哲学思想,如医学、农学中的哲学思想吸收进了哲学史,不但丰富了中国哲学史,也为自然辩证法的历史提供了可备参考的材料。

三十年来,中国哲学史不能不受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的总形势的影响。中国政治上的安定团结或动荡不安,马列主义的原则是否得到正确的贯彻,直接关系到中国哲学史的发展、停滞,甚至倒退。

国民经济正常发展的时期,也正是我国政治生活正常进行、党的政策较能得到正确贯彻的时候。这时,学术上可以开展正

常的争论,学术活动可以比较健康地进行。相反,人为地制造紧张,打棍子、扣帽子的时候,也就是学术停顿的时候。

建国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几次大论战,直接与中国哲学史有关的,有: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有对胡适实用主义的批判。通过这些批判使人们把学到的理论武器用到战场上,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开展正面的交锋,不论是参战的还是观战的,都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教育,锻炼了理论队伍,也提高了识别历史唯心主义的能力。

1957年以后,国内国际形势起了变化,把反对修正主义当作头等大事来抓。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水火不相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当然要反对修正主义。问题是不能把不是修正主义的东西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斗争。今天回顾一下,至少可以说有把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弄混的情况。有时候往往把人民内部的不同意见当作敌我问题来处理,由此造成的损失是惨重的,甚至是无法弥补的。有些全国性的大批判,如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问题;关于合二而一的问题;关于人口论的问题等,都是以政治运动代替学术讨论,以讨论开始,以批判告终的。

这种风气造成了学术界的不安定、不团结。学术界(中国哲学史也在内)出现了极不正常的现象,有一派人“一贯正确”,是专门批判别人的;另一派人则是只能受批判,无权答辩,成了学术上被专政的对象。关锋的《反对哲学史方法论上的修正主义》一书,集中表现了这一时期的恶劣学风。

全国范围内从1957年以后直到“四人帮”的垮台,近二十年来,一贯反右倾机会主义,不反对“左”倾机会主义。于是“左”倾思潮泛滥成灾。三年困难时期,学术界又有点复苏。这时中国哲学史和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也有些前进。由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的教材编写工作开始了,这时大学文科教材有二百

多种上马,有教科书和教学用的资料,中国哲学史也在内。这一时期举行过山东的孔子讨论会,湖南的王船山讨论会,都是主办单位邀请全国哲学史界的人士参加的。这一时期,学术空气比前些年大批“右倾”时期活跃,批判孔丘和赞成孔丘的言论都得到发言的机会。

“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大搞影射史学,为其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这十多年,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处于混乱、倒退的局面。这是有目共睹的,这里不再多说。这是前进中的逆流,历史终归要前进的。

除了上面所说的一些情况以外,关于哲学史方法论方面的论文,三十年来,发表了不少。比如像关于哲学史的对象与范围的问题,关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在人类认识史上的作用问题,关于推动哲学思想发展的动力的问题,关于自然科学在哲学中的重要作用问题,等等。像这些重大问题,解放前不可能提到研究的日程上来,而今天则受到哲学史工作者的普遍关心和重视。能够提出这类问题,本身就意味着研究工作的深入,理论水平有了普遍的提高,表明面临着新的起点。

存在的问题

三十年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有不少问题,其中有些问题的性质甚至是严重的。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将会给这一科学带来严重的后果。

首先,我们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应该批判封建主义的任务重视得不够。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范围绝大部分是封建时代的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当然是有着进步与落后、唯物与唯心之分。过去我们在研究中坚持哲学史的党性原则,一般地注意了